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文库

发展伦理学与 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意蕴

FAZHAN LUNLIXUE YU KEXUE FAZHANGUAN DE LUNLI YIYUN

寇东亮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导 论	1
一、发展研究:范式转换与价值转向	1
二、发展伦理学: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9
三、科学发展观:发展伦理学的实践范本	12
 第一章 发展伦理学的兴起与根据	17
一、发展伦理学:一个新学科的兴起	17
二、转型发展、反发展与社会风险:发展伦理学的实践根据	22
(一)“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凸显	22
(二)“转型发展”及其伦理需求	27
(三)“反发展”及其伦理遏制	32
(四)社会风险及其伦理应对	37
三、应用伦理:发展伦理学的理论根据	42
四、“四位一体”:发展伦理学的价值论根据	48
(一)发展伦理学的生态价值论根据	48
(二)发展伦理学的经济价值论根据	51
(三)发展伦理学的社会价值论根据	53
(四)发展伦理学的人学价值论根据	55
 第二章 发展伦理学的对象、主题与使命	58
一、发展伦理学的“应用”性质	58

二、“人”与“物”的关系:发展伦理学的根本问题	61
三、“能”与“应该”的关系:发展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74
四、发展的合理性:发展伦理学的主题	78
五、发展价值观的建构:发展伦理学的使命	83
第三章 发展伦理学的基本内容	88
一、为何发展: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88
(一)“两次提升”的发展目标	89
(二)发展是为了人本身	91
(三)发展是为了人的一切合理需要	96
(四)发展是为了一切人的合理需要	101
二、谁在发展: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105
三、凭何发展: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111
(一)客体动力的伦理整合	111
(二)主体动力的伦理整合	117
(三)“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126
四、如何发展:发展进程的伦理控制	129
(一)发展政策的伦理导向	129
(二)发展决策的伦理抉择	135
(三)发展管理的伦理取向	138
五、发展如何:发展结果的伦理评判	145
(一)“两种尺度”的统一	146
(二)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	148
(三)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151
(四)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	152
第四章 科学发展观内涵与原则的伦理透析	155
一、科学发展观内涵的伦理透析	155

(一) 科学发展观之“科学”	156
(二) 科学发展:一种新的发展范式	159
(三) 全面协调可持续:一种新的发展方法	161
(四) “科学”与“人本”的统一	164
二、科学发展观人本原则与德性伦理	166
三、科学发展观全面原则与公正伦理	177
四、科学发展观协调原则与和谐伦理	183
五、科学发展观持续原则与生态伦理	189
第五章 科学发展观基本内容的伦理架构	197
一、科学发展观客体内容的伦理架构	197
(一)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发展伦理诉求	198
(二) 社会全面进步:一种总体性发展的伦理要求	200
(三) “保护自然”与“建设自然”的统一	205
二、科学发展观主体内容的伦理架构	213
(一) 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向度	213
(二) “总体的人”:现代人发展的伦理吁求	217
三、科学发展观主客体内容统一的伦理架构	222
(一) 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与“真实自我”的生成	223
(二) 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与“角色自我”的生成	228
(三)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与“生态自我”的生成	233
第六章 科学发展观实施的伦理保障	240
一、制度伦理:科学发展观实施的必要条件	240
二、社会资本:科学发展观实施的伦理黏合剂	245
(一) 社会资本的含义	246
(二) 社会资本的伦理意义	248
(三) 社会资本的积累	250

三、生活世界:科学发展观实施的微观基础·····	253
四、能力建设:科学发展观实施的主体要件·····	262
(一)能力建设的意义 ·····	262
(二)能力水平建设及其伦理要求 ·····	265
(三)能力运营及其伦理要求 ·····	267
参考资料 ·····	270
后 记 ·····	275

导 论

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在当今时代,发展问题更是成为人类最为关注的一个理论和实践课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人类发展思想的演进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什么是发展、发展的目的何在、推动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怎样评价发展,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为何要科学发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发展与伦理有何关联、发展的伦理根据是什么、伦理如何关怀发展,等等,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学术探讨,在今天显得十分必要、紧要 and 重要。

一、发展研究^①: 范式转换与价值转向

在人类思想史上,“发展”最早是一个哲学范畴,是哲学家在从变动不居的现象出发,追寻物之为物和人之为人的“本原”时所提出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是向着“至善”变化和运动的,这种向着“至善”的变化和运动,就是发展。哲学家们一方面用发

① 所谓“发展研究”,广义地说,是指一切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重在探讨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及总体趋势等;狭义地说,是特指 20 世纪以来有关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重在探讨当代社会的发展问题,这种发展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学科群,主要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发展未来学、发展战略学、发展哲学等。这里所说的“发展研究”,主要指狭义的发展研究。

展概念去理解一切事物,形成了一种宇宙目的论学说,“在这种学说里,整个宇宙以及宇宙中的万物都在朝向某种不断地变得比过去更为美好的事物而发展着”^①。另一方面,他们也用发展概念去阐释人类社会现象,形成了体现其时代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都是古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代表作。

但是,真正意义的社会发展研究始于近代,形成和勃兴于20世纪中后期。近代以来,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崩溃和宗教世界的衰微,一个由人构成的世俗社会在不断崛起和壮大,对这个世俗社会的起源、本质、演变历程及未来走向等问题的探讨,成为人类理性的兴奋点和聚焦点。莫尔的《乌托邦》、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霍布斯的《利维坦》、哈林顿的《大洋国》、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康德的《论永久和平》、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等,都从不同方面揭示和探讨了这些问题,提出了自然法、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目的王国、绝对精神、空想共产主义等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研究的早期代表作。但是,这些研究及其所形成的理论,尚未完全从政治学、哲学等中分离出来,还内在地同一于政治学理论、哲学理论等理论形态中,总体上处于零散的或理性思辨的形而上层面。19世纪,孔德、斯宾塞等人否定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形而上学式探讨,将实证方法应用到社会发展研究中,创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进化论为根据、以追求客观性和可度量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发展理论关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社会变迁与社会进化,认为发展的过程就是从“机械团结”型社会向“有机团结”型社会、从传统情理型社会向现代法理型社会、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从非理性社会向理性化社会等的转变。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作为

^①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8页。

自己理论研究的主题,全面系统地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即唯物史观。

进入 20 世纪,工业文明的双重实践效应越来越明显。工业文明的加速发展,一方面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和危机,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益残酷的战争、社会贫富悬殊、资源环境危机等。这些危机的出现表明,既有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存在着内在缺陷。人类要获得持续发展,就必须对自己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和作出全面调整。20 世纪上半叶,“凯恩斯革命”、“罗斯福新政”等,就是在应对现代社会发展危机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种理论的和实践的尝试。20 世纪中叶,发展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和展开。它的兴起一方面是对工业文明产生的发展危机的回应,另一方面,更与二战后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凸显密切相关。

20 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发展观经历了从唯经济指数独尊的时代,到同时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指数的时代,再步入一个强调人文指数的时代。与此相对应,人类对“发展”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学分析”到“社会学分析”再到“生态学分析”,最后到“人文学分析”的转换过程。这些转换不仅体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对发展实践一种反思的发展观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一切反映在有关发展理论的学科角色上,则表现为从经济学主导的时代过渡到综合性学科整体谋划的时代,现在正进入一个人文学科大显身手的时代。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发展研究以经济学为主导范式,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即发展经济学。这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刘易斯 (William Arthur Lewis) 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罗斯托 (Walt Whitman Rostow) 的《经济增长阶段》等。这种研究把发展问题完全归结为一个经济学问题,把发展主要看做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发展 (Development) = 增

长(Growth)”,是这种发展观的绝对信念。它认为,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经济指数的增长,发展过程是纯粹的物质财富增长过程。在这种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至上发展观。这种发展观隐含着“经济人”、“经济决定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等价值预设。实践证明,经济增长至上发展观,对促进经济发展、迅速积累财富、医治战争创伤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对许多经济落后的欠发达、不发达国家很有吸引力。但是,这种发展观没有把“发展”和“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把发展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无视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及其内在关系。以经济的增长为单一目标的发展导致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盲目攀比经济增长速度,偏重发展重工业,必然偏离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实现诸如平等、就业等社会目标,并对环境和生态平衡产生破坏。所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使人类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如两极分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

20世纪70~80年代初,发展研究以社会学为主导范式,形成了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等学科。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计划遭到失败,发展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在短期内取得成功,这促使许多学者开始对这十年所倡导的“发展=工业化=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进行批判性反思。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主张从社会进化论角度揭示发展的本质,美国学者托达罗(Michael Todaro)强调发展是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重组和重整的内在的多维过程,英国学者西尔斯(Dudley Seers)认为发展的整体状况取决于一个社会的不平等、贫困、就业三个基本问题的解决情况。罗马俱乐部在其先后发表的《增长的极限》(1972)、《人类处在转折点》(1974)、《重建国际秩序》(1976)、《超越浪费的时代》(1978)、《人类的目标》(1978)、《学无止境》(1979)等报告中,力图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问题

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敦促国际组织和各国改革社会和政治制度,并采取必要的社会和政治行动,以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年)”计划指出,发展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1983年,佩鲁(Francois Peris)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发表《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观。“整体的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它在各种具体分析之外,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内在的关系中考虑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一致”;综合的既可以指“各种单位和因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整体”,还“可以指一定数量的地域的一体化,也可以指各个部门、地域和社会阶级之间得到加强的内聚力”;内生的是“表示一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①。这种新发展观强调“文化价值”与发展的内在关联,认为:

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②

这种发展观改变了经济增长发展观的局限,强调发展不等于增长,发展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统一,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人本身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协调变化的过程。用公式表示就是:“发展=现代化=整个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但是,这种综合发展观只注重社会内部各要素发展的相互关系,没有进一步揭示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内在关联性;同时,它更

①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2~3页。

②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多关注当前一代人的发展问题,对代际问题考虑不足,忽视了发展的生态基础和可持续性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研究以生态学为主导范式,形成了发展生态学、发展未来学、发展战略学等学科。生态觉悟是 20 世纪人类最重要最深刻的精神觉悟之一。1949 年,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问世。这本书是奥尔多·利奥波德对于自然、土地和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与命运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晶,他倡导一种开放的“土地伦理”,呼吁人们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1962 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这本书“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①。卡逊在该书中通过大量论据,论证了化学农药对于地表水和地下水、土壤、森林、气候、野生动植物以及人类健康的危害。1972 年,罗马俱乐部在其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发展观,即增长极限论。它认为,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按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在今后 100 年内的某个时期将达到极限,因为,地球是有限的,人类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增长极限论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人类应制止增长和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发展观警告人类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角度看待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不能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人类要注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应考虑资源环境的最终极限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行为的影响。增长极限论把自然纳入社会发展系统中,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这种观点逐步被世人所普遍接受。20 世纪 80 年代勃兴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真正确立了发展的生态学维度。1987 年,联合国世界

^① [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前言第 12 页。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清晰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观。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

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

“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

“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①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观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和协同进化。可持续发展既不是传统的以掠夺自然、征服自然为特点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将人类利益完全等价于自然界中草木禽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极端自然主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共存、共生、共荣,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价值。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人类的代际关系纳入发展的框架中,进一步凸显了发展中人的概念的全面含义。“可持续发展”研究,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是一种有约束、有节制、有评价、有规范的发展。这里的“规范”不仅包括法律的和技术的规范,更包括以人类生存为基础、以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价值尺度的**伦理规范**。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展研究以人文学为主导范式,形成了发展哲学、发展伦理学、发展美学等学科。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

①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要求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基本需求战略”,主张把保证人的基本需求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第一个中期计划(1977~1982)中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理念。198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关于发展问题的小型谈论会,会议指出:

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包含两个方面的主要要求:就模式来说它必须是基于人民的文化本性从内部形成起来的;就最终结果来说它必须以满足居民的实际需要来为人民服务。^①

这就是说,发展根基于人民的文化本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必须让人民参与发展过程。1983年,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提出的整体发展观,本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他指出:

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普遍地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②

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随着人权哲学、文化哲学等的全面兴起,人们将发展与人的内在本质需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发展看做是人的基本需求逐步得到满足、人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和人的价值的真正实现的过程,把发展看成是人的内外文化发展的过程。1986年,第4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

① 转引自许先春:《走向未来之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②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4页、第108页。

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①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人文发展指数,指出社会发展应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人为中心。1995年“社会发展世界首脑大会”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了“社会发展以人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的观点。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1999年出版《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从“自由”角度阐述发展的本质及内容。他认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是为人的福利、人的目的价值服务的,它们只是发展的手段而已。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本身,“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②

二、发展伦理学: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一般说来,任何发展观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伦理基础。当我们在研究“如何发展”之前,首先要对“应当怎样发展”做一个价值论的考察。一个成熟的发展模式,要具有合理性,不仅要有动力机制,而且应当具有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自我反省、自我规范的伦理机制。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付出那些本来可以避免付出的代价。传统发展模式只有动力机制(如追求无限占有、消费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自由竞争等),缺乏相应的自我约束、自我评价和自我规范的伦理机制。它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等问题却关心不够,或者关心不到位。社会发展理论被看成只是研究社会“如何发展(得更快)”的“科学”,忽视了社会“应当怎

① 《发展权利宣言》,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0977.htm>。

②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贻、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6页。

样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个目的论、价值论和伦理学的问题。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在把三大基本的道德问题推向前沿:

生活美好与物品丰富之间是什么关系?

社会内与社会间公正的基础是什么?

社会对自然力与技术的态度应由什么标准来加以决定?^①

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医学伦理、性别伦理、媒体伦理、网络伦理、动物伦理及国际伦理等,是最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而兴盛起来的新型分支伦理学科。面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诸多问题的不断涌现,这些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与伦理的深层分裂进行反思,试图对各自领域中涌现出的紧迫的伦理道德问题,提出各种有说服力的解答。这种反思主要有三个向度:一是人文主义者对发展与伦理分裂状态的反思,及对发展的人文、价值内涵的哲学揭示;二是政治学家对政治与伦理分裂的反思,及对政治学与伦理学联手的希望;三是经济学家对经济与伦理分裂的反思,及对市场经济的伦理价值维度的更多关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与哲学家呼吁联手探讨发展问题。^②

1941年,经济与人道主义运动奠基人路易·约瑟夫·勒布雷特(L. J. Lebre)把发展界定为价值观的基本问题和新文明的创造,在他看来,发展以人道为基础,离开了对人、人性的关注,发展研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他把发展描述为:

一个特定人群及构成它的所有近邻人群单位,以可能的最快

①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② 陈忠:《发展伦理学的范式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节奏,以可能的最低代价,并考虑到存在于(或应当存在于)这些人群与近邻人群之间的团结纽带,从较少人道向较多人道阶段的一系列过渡。^①

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多种标准相继提出,如哈根(E. E. Hagen)的五项指标(包括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识字率、健康水平和就业状况),莫里斯(M. D. Morris)的实际生活质量指数(包括识字率、预期寿命指数、婴儿死亡率)以及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指数(包括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等)。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非经济要素被引入发展问题的研究,发展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学意义。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伦理”、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罗尔斯的“正义伦理”、社群主义的“德性伦理”等,都旨在揭示传统伦理学的缺陷,分析导致传统社会发展失误的伦理根源,力图在人类伦理观的重建中,确立一种发展伦理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伦理学在有关解除饥荒和食品援助的哲学争论中逐步得到拓展和深化。作为对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关于解除饥荒的功利主义争论和格伦特·哈丁(Garrett Hardin)“救生艇”伦理的回应,许多哲学家开始探讨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国家中的人)在道义上是否有义务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受饥饿困扰的人们。20世纪80年代初,尼格·道尔(Nigel Dower)、奥尼尔(Onora O'Neill)和杰罗姆·M赛格尔(Jerome M. Segal)等道德哲学家逐步形成一种共识,认为解除饥荒和食品援助只是解决饥饿、贫穷、落后和国际间不平等等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道义上的援助,而是更为广泛、更富经验性的信息沟通渠道,与第三世界发

① 转引自[美]德尼·占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展中国家的伦理道德相适应的政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些更具实质性的帮助和更加公平合理的南北关系,依赖于对“发展”的正确理解。^①1987年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IDEA)的成立,使发展伦理学成为发展研究的一个跨学科领域。虽然发展伦理学兴起于西方,但是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遍布世界各地。现在已有来自50多个不同国家,跨越30多个学科和专业的500多名专家,正式加盟国际发展伦理学协会,共同致力于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

发展伦理学是伦理学和发展理论的分支学科,是伦理学与发展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如上所述,传统发展观的根本危机是发展问题上的价值观危机,传统发展观只关注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而发展”和“怎样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问题关心不够,或关心不到位。发展伦理学从伦理价值维度看待发展,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力图透过人与人的关系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伦理学是对人类整体发展实践的反思、评价与规范,旨在对传统发展观重新进行伦理评估与审视,为发展确立合理的价值目标,为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提供具体的伦理指导,以便为在实践上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和危机提供伦理依据。发展伦理学集中体现了人在整个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和应担负的道德使命、道德义务、道德责任,是整个发展实践的自我调控、自我校正、自我约束、自我免疫的知识机制,是保证社会健康、合理、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发展伦理学既拓展和深化了发展研究,也拓展和深化了伦理学研究。

三、科学发展观:发展伦理学的实践范本

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面临的各种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3年4月,胡锦涛在广东

^① 韩丹:《当代西方发展伦理学初探》,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10期。